

引文格式：张丹旸. 独特性与内在性：巴迪欧的事件诗学建构尝试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2）：85-95.

独特性与内在性：巴迪欧的事件诗学建构尝试

张丹旸

摘要：阿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对存在、真理、主体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指出事件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优先性。随后，他将事件哲学基本原理延伸至文艺研究，着重思考文学艺术与哲学、真理之间的关系，提出“非美学”文艺观。非美学方案呼吁新颖事件的发生，力图利用艺术独特的语言形式生产真理，从而实现哲学与艺术的“解缝合”。巴迪欧尝试提出一种强调文学独特性与内在性的事件诗学，注重作为实际发生事件的文学，启发文论研究走出针对本质问题的无谓论争。虽然他的事件性思考对当代文学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但其诗学建构仍具有局限与不足。只有多方吸收其他理论家丰富的文学事件思想资源，事件诗学的当代理论体系建构才能成为可能。

关键词：非美学；文学事件；独特性；内在性；事件诗学

作者简介：张丹旸，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丝路审美文化中外互通问题研究”(17ZDA272)。

中图分类号：B565.59; I0 ; J0-0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2095-042X.2023.02.010

阿兰·巴迪欧吸收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拉康等人思想，并结合19世纪数学家康托的“数元集合论”，对存在、事件、真理、主体等哲学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为研究哲学空间内艺术状况以及各类当代文艺问题提供了一种事件性理论框架。随后，他在文学艺术领域理解事件，并对马拉美、贝克特等人作品做出文本分析，尝试建构起一整套从文学到哲学的事件诗学。巴迪欧传承西方古典诗学传统，重视对文学作品语言修辞的分析和阐释，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以“独特性”(singularité)与“内在性”(immanence)为基本特征，强调文学理论应从文学活动内部，探究文学性基本法则以及文学本身的精神与文化价值。巴迪欧为目前逐渐兴起的文学“事件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参照，但其事件诗学思想的体系建构还存在一定不足。

一、以“事件”为核心概念的哲学思想

通过运用公理集合论的数学系统和符号化语言，巴迪欧发展出以“事件”为核心概念的哲学思想，并据此思考一种艺术事件观与事件诗学的可能性。

巴迪欧首先指出事件的实存与概念性定义。他聚焦古希腊巴门尼德对存在“一”与“多”的探讨，指出存在既不是“一”，也不是“多”，而是展现（自身）的东西。传统本体论哲学思想将存在视为一个完满的、连贯的“一”，但这样一种连贯“一”的存在形象，是主体思考与主动操作之后的结果。因此本体论颠倒了强制性和合法性、连贯性和不连贯性，将自己视为公理，而剔除了一切不合规范的存在之物与偶然事件发生的可能性^{[1][42]}。存在的真实状态并没有什么秩序可

言，现实存在本身是以非“一”的、不连贯的“多”的形态出现的。秩序只是一种“视多为一”的运算与“情势”操作，经过主体对存在之“多”的理解后呈现出来。并且“情势”势必是“多元”的，因为每一种理解方式都会形成一个特殊的“一”的运算与“情势”操作。因此，哲学关于存在的本体论探讨应该从事件入手，重新关注存在的真实状态，思考纯粹的、不一致的“多”。

巴迪欧指出，存在的真实状态是混乱的，并且具有流变性和不稳定性，蕴含生成新事物的生命力。由于变化的活跃性力量，十分有可能在原有情势中出现超出大“一”的内涵之物，而这种不确定的溢出与可能性的发生就被称为“事件”。巴迪欧以数学公式标识事件，使原本被存在论忽视与禁绝的偶发事件成为强势存在，展示出一种非常态的全新存在的出场。事件的定义如下：

$$X \in S, e_x = \{x \in X, e_x\} \quad (1)$$

式中， S 表示历史情势； X 表示事件场所或称“事件位”，事件就是 e_x ^{[1]224}。在巴迪欧概念体系中，情势是一种展示多元存在在场的概念，并体现出某种“视多为一”的运算模式与结构体系。而至少拥有一个事件位的情势，就被称为“历史情势”。相对于和谐、连贯的自然情势，历史情势是人为建构的，具有反自然与不稳定的特征，这为非常规事件因素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事件作为此前被忽视的特殊存在，也就是非存在，其思想场域也应是反自然与非常规的。事件位则是事件的存在前提，并决定事件的类型。独特性是事件位的本质属性。根据方程式，事件位属于历史情势，拥有所归属情势中能够呈现却无法再现的元素 x 。事件位的存在，使历史情势具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成为不连贯的情势。可以如此理解，事件位中有某些虽然客观发生，但容易遭到遗漏与忽视的事件性因素，从而具有生成全新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从定义中可知，所有事件都有一个在历史情势中独特化的事件位，也就是具体明确的事件发生场所。但不一定所有的历史性情势都必然产生事件。事件位只是开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有可能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事件位的实存只能在事件发生后回溯性地获得认定。

厘清了这些概念，事件的定义也就逐渐清晰了。根据式（1），事件就是位于历史情势中独特场所内的一种偶然性改变与发生。事件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属于事件发生场所 X 的事件性元素 x 。事件性元素 x 只有在某种特定历史情势下的事件场所内，才有可能获得可见性；在其他历史情势下则有可能遭到遮蔽，体现为空。其二便是事件发生本身。到底如何认识事件，巴迪欧认为重点在于对“事件 e_x 是否属于其事件场所原先的历史情势 S ”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巴迪欧做出了两种可能性论述。第一，事件属于原有情势，因为事件实际上是从先前情势中展现与生发出来的。但是，事件本身具有独特的事件性因素，超出了原有情势的规则体系，使得事件在原先情势中难以获得体现与表达。第二，事件不属于原有情势。事件本身所蕴含的张力与革命性，在原有情势中无法获得体现，遭受到存在的禁绝与忽略，呈现出无事发生的虚空状态^{[1]229}。巴迪欧指出，事件概念其实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存在痕迹与客观发生事实，是非存在的存在，处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而且，事件打开了一个生产结果与意义的空间，在其中可以形成多元真理^{[2]385}。而如何定义事件，以及事件如何产生意义，需要依赖一种解释性的介入和主体对事件的发现^{[1]239}。

在《世界的逻辑：存在与事件 2》中，巴迪欧进一步明确了事件与主体、真理之间的联系。巴迪欧强调，事件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优先性，主体、真理概念都是后-事件的产物。事件是真理得以产生的基础与根本，真理始终出现于事件发生后，以例外状态插入存在的连续性中。主体则是事件认识与真理生成间的必要中介。事件会促使一个积极活跃的、忠实于真理的全新主体出现^{[2]384}。而主体也在对真理与事件的理解中显现与建构自身。有限的主体始终相信存在一种

无限的、整全性的真理，但是自己所能认识的真理是有限的。拥有真理信念的主体，发现了刺激真理现身的事件。在主体的介入下，原先难以理解、不可辨识的事件获得理解与认识，而主体也在进入事件、遭遇事件的介入过程中获得知识和一定真理。因此，超越性真理是永恒而普遍的，与任何特定的、历史的有限主体无关。多主体可以主动介入情势的断裂，重现事件，形成不同认识，给予世界不同的秩序与逻辑，从而塑造有限样态的真理。经由主体操作，事件所传递的空洞、普遍的真理获得了验证，而引发真理的事件也因为主体实践反过来被认定为“真”事件。

巴迪欧致力于将超出理性呈现手段的事物，即事件，与存在问题、主体问题联系起来，从而阐明普遍真理的存在与有效性。不确定断裂事件的发生，具有激活空无存在、显示“非存在的存在”的能力。事件发生使得被视为空无与混乱的情势反过来变得可以被认识^[3]。巴迪欧预设了普遍性永恒真理的存在，通过发现事件、命名事件，主体赋予不可辨识事件以可辨识形态，打开了捕获真理的可能性。真理的实存状态不是“单一的”“给定的”，而是多元的、无限延展的，超越了有限的人类经验。真理不是存在的去蔽（海德格尔），抑或历史上某一特定时期实践或话语的不同产物（福柯），而是由真理程序生产与建构出来的不一致的多。存在永恒的多元真理，但它们不能统一在同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之中。保证真理永恒性与普遍性的是它的无限性。真理可以无止境出场与再现，从而在不同的世界与情势中获得反复验证。真理不是尽可能接近绝对正确的知识，而是通过破坏知识的确定性，创造无限可能^[4]。无限真理只有以事件为契机才能获得显现。

相较于怀特海过程哲学事件观，巴迪欧更为强调事件的偶发性与绝对中断。怀特海认为，世界是由众多流动的、互相关联的事件构成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些凝固的、静态的、孤立的实体。宇宙整体都是关系性、有机性、过程性的，人类的实践活动也是一种构成世界的实有事件与现实存在^[5]。事件发生之后不会造成绝对的永久性中断，而是最终回归连续流动，形成变化过程中的一次重叠与褶皱。事件的根本属性是“生成”，它总是穿越不同层次，改变自身的本质，而无法固定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之内^[6]。如果说过程哲学事件观强调在流动连续过程中的某些事件性差异与生成，那么巴迪欧便揭示了事件发生所具有的溢出性与偶发性，强调了激烈突变的瞬间。巴迪欧事件理论启发哲学重新思考主体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即当面对存在的喧嚣以及复杂混乱的变化时，主体应该从何种角度入手理解与思考存在，如何才能获得一种富有价值与真理性的认识。他强调，主体只有通过发现中断事件，积极认识、把握与归类多样的变化，才能形成一种认识，而意义真理问题便在不断理解与接近事件的过程中被发现与建构，事件的发生伴随着意义的产生。价值与真理不是静止的、普适的与永恒的，而是与事件和认识主体息息相关。

通过对事件的强调，巴迪欧肯定普遍永恒真理的存在，对之前盛行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想做出批评，并反驳各类“终结论”所引发的当代真理危机。巴迪欧坚持真理的合法性存在，指出哲学作为思想的场所是追逐真理的活动。哲学思辨活动就是主体的某种后-事件反思，哲学的功能在于缝补事件对现实的撕裂，将原先无法被认知的事件变得可以理解。哲学应致力于构建一个把握真理的装置，为诸多真理的共存提供一种清晰的表达。哲学思辨活动并未终结，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存在价值^[7]^[17]。

二、非美学：艺术与哲学的解缝合

巴迪欧事件哲学为思考哲学与艺术新关系以及艺术真理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他指出，哲学和艺术是两种不同的思想形式，哲学并不生产真理，而是构想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思

想空间，容纳与处理“去实体化”的真理概念。因此，真理生产需要依赖于四种生产程序：政治、科学、艺术和爱。这四种程序对所有可以生产出真理的活动进行了说明与归类。四种领域内发生的独特性事件也影响了当代哲学的重构行动，并且引发真理效应^{[7]64}。巴迪欧在《哲学宣言》中指出，真理程序提供了哲学研究的基础与前提，但是哲学却不能等同于这四类真理生产程序的总和。哲学一旦与任意一个生产程序缝合，哲学的思辨功能便会转交给这一生产程序，从而引发“哲学无用”的形而上学终结论观点。因此，哲学活动与艺术活动不能等同。艺术以感性形式展示主体对真理的认识，并且生产出不同于其他程序的特定真理。而哲学则是一种更高级的思想活动。哲学反思是以艺术之思为对象，是“思想的思想”^{[8]54}。

基于这样的认识，巴迪欧提出了一种艺术与哲学之间相互关联又明显区分的“非美学”思想。非美学否定哲学对真理的生产，使艺术自身成为真理的生产者，并且反对和阻止艺术变成哲学的对象。艺术具有独立合法性地位，不再是哲学的附属品，并且反过来影响哲学思想的形成。巴迪欧批判了艺术低于哲学的传统等级观念，指出艺术作为一种生产装置，具有独立于哲学的主体性，自身便是真理的生产者。艺术能够由事件所发动的艺术过程生产真理，并且通过艺术生产程序所呈现的真理只为艺术所特有^{[9]9}。非美学方案强调了艺术自身的独特性与真理的生产性。巴迪欧指出，正是因为非美学认识对艺术活动独特性与内在性的强调，使艺术能够直接作为生产者，形成特定的真理。独特性强调了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与哲学不能等同，并且也有别于科学、政治和爱等其他真理生产程序。而内在性则强调了艺术与其所生产真理的适配性，由艺术程序所表达的真理绝对属于艺术活动。艺术不再是真理的工具与容器，真理是艺术本身固有的，艺术与真理不可分割。

为阐明非美学的独特性与内在性内涵，巴迪欧对西方传统美学思想成果进行梳理，将其归纳为三种方案：教诲式、浪漫式和古典式。他指出，没有哪一种美学方案兼顾独特性与内在性。教诲式美学方案认为艺术具有教化功能，通过艺术教化能够实现一定的真理效应。真理不是艺术的产物，艺术不生产真理，因此不具有内在性。而浪漫式美学方案虽然认为艺术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真理自行置入作品之中。艺术的感性形式能够为普遍真理解蔽。但是艺术与哲学的界限并不清晰，哲学所探寻的普遍真理没有和艺术作品内在的专属真理做出明确区分，因此不具有独特性。而古典式美学方案是对教诲式与浪漫式矛盾的调和，认为真理与艺术无关，因此既不具备独特性，也不具备内在性。巴迪欧指出，传统美学方案已达到饱和状态，未能抓住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真理关系的本质，并且对现当代美学问题不具备充足的解释力。西方美学危机呼吁新的理论范式，对当下艺术现象进行说明与阐释。

现当代艺术活动颠覆了古典的、传统的艺术概念与美学叙事话语模式，文化工业的威胁、商品化逻辑的操纵、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使得先前确定的艺术体制与美学规则遭到否定，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逐渐模糊^[10]。艺术逐渐形成自身的哲学自觉，成为一种独立表达观念与思想的方式。而走向反本质、反普遍主义、反中心论的艺术，使得我们对艺术作品的鉴赏、解释、接受等各方面出现困难。许多现当代艺术家与其说创作了一件艺术作品，不如说通过作品向大众提出了“艺术是什么”的问题，艺术作品本身成为一种哲学表达。巴迪欧认为，非美学对独特性与内在性的双重肯定，既强调了艺术的自律，又能够为“艺术终结论”之后的美学叙事提供一条新思路。艺术作为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活动，其中关节点是艺术事件的爆发与凸显。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中指出，哲学曾对艺术进行过两次侵犯与剥夺：第一次通过把艺术视为只能满足快感的东西而造成艺术本身的短命；第二次则将艺术视为一种异化形式的哲学，哲学试图把自身变成一种艺

术形式。艺术通过自身的哲学自觉最终走向终结。这一终结导致现代艺术产生了一种毁掉美的欲望与冲动^{[11][12]}。杜尚运用现成工业制品充当艺术作品的戏谑式实验、安迪·沃霍尔《布里洛盒子》对现成超市货架上牛奶包装盒的复制挪用，这些艺术事件的出现体现出艺术试图逃避美学奴役，进行自我哲学言说的积极尝试^{[11][187]}。通过现成品艺术事件，艺术活动提出专属于自己的独特真理，艺术从视觉形象变成一种哲学思维、一种有关艺术的自我意识，成为真理生产的一条重要道路。

非美学方案如何实现独特性与内在性的双重肯定，核心就在于对事件概念的强调。事件哲学指出，事件是出现于历史情势内的一个不可预料的偶然性改变。而且，真理与事件不可分割，真理依赖于事件作为其显现自身的突破口。因此，艺术作为一种真理生产程序，在制造真理之前，需要艺术事件的发生作为前提。任何真理都发源于事件^{[9][13]}。而关于“艺术是什么”的认识，就是艺术活动所生产的真理。因此，关于艺术的本体论认识应当从作品内部挖掘与思考。艺术作品作为“真实出现的”存在物，是艺术真理的肉身与现实存在的证明。艺术真理的唯一存在载体即艺术作品。而艺术作品的出现能够形成事件，冲击当前艺术状况，生产出独特的内在性真理。

不过巴迪欧强调，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形成艺术事件，造成原有艺术情境的震荡，刺激真理出场。作为真理载体的艺术作品具有出现艺术事件的可能性，是艺术事件发生的场所。但是艺术作品不能与事件等同。艺术作品需要在形式、内容、语言等方面不断创新，形成事件性效果，才能接近真理。为何艺术作品不能直接承载真理，而是需要艺术事件作为中介？原因就在于真理的无限性与艺术作品的有限存在之间的矛盾。在时间、空间上都有限存在的艺术作品，只能把握无限真理的一个片段，是永恒真理在一定情境下暂时有效性的体现。真理生产是一个永恒的动态过程，而有限的艺术作品只能显示一部分真理。偶然出现的艺术事件打破原先艺术认知，无法被归纳于先前的艺术话语体系与结构规则中，显示出此前不为人注意到的真理向度^[12]。此外巴迪欧还强调，一部作品无法体现无限性的真理，真理既不来自某一天才作者的直觉创造，也不来自对某件艺术作品的意义阐释。因此单个艺术作品不能形成事件，真理并不会在任何作品中都自我显现。虽然真理要依托作品这样的实体来存在，但艺术活动中源源不断出现的复数艺术作品才是真理的存在载体，艺术作品是真理的主体节点，是连接艺术事件与真理的中介。艺术事件与作品有关，而不受到某位艺术创作者或批评家话语的影响。艺术事件需要一组新颖艺术作品连续性出现，形成复数的作品集合，造成事件性影响。只有经过不同情境下不同作品的反复验证，才能编织出艺术真理的存在，并确保所生产真理的有效性与普适性。

可以看到，非美学方案是巴迪欧事件哲学思想在艺术层面的一次具体实践。巴迪欧用“非美学”来概括他对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以及艺术运作过程的思考。不过，非美学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非美学不是美学，更多的是一种针对艺术活动的哲学思考与美学实践。非美学方案通过对事件的强调，将艺术直接视为一种真理生产活动，赋予艺术活动独立地位与存在价值，并拆开了艺术与哲学之间的缝合。艺术与哲学不能混同，对巴迪欧来说，艺术保持着一定的感性自律。艺术活动带来新颖性事件，利用艺术特有的语言和形式表达真理，使得此前关于真理的知识不断遭到侵蚀、切割、打断，造成认识论的断裂，从而启发、拓展和更新真理认识。而哲学活动运用概念、逻辑、推演等理性思辨方法捕捉真理，使得不同生产程序所生成的多元真理彼此共存，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宣布普遍性、超越性真理的存在。非美学方案实现了哲学思辨与艺术体制的“解缝合”(dé-suturée)，直接赋予艺术活动以真理生产的能力^{[7][42]}。

三、文学事件与真理生产

非美学对艺术独特性和内在性的强调，呼吁有影响力的新颖艺术事件的发生，强调艺术活动的创造性。基于这样的事件性认识，巴迪欧在《文学在思考什么？》一文中指出，应将文学本身视为一种独特的人类实践活动。文学所重点思考的，就是如何为实在界（réel）打上独特的文学性烙印，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学性的可能。文学允许创造语言的特殊用法，让读者见证一种独特文学语言的诞生^{[13]387}。当然，巴迪欧认为真理的生产过程是艰难的，生命有限的主体只能生产出有限的文学性真理。然而艺术的精神就在于生产出（人造的）有限以反抗（自然的）无限，通过源源不断的文学写作，呼唤一种新的可能和新的自由。文学不只是静观式思考，更是将我们不断拉向文学本身的永恒行动。巴迪欧意识到，文学就是一场自我生产的永恒书写事件^{[13]393}。文学能够形成艺术事件，从而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特有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真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与文化实践，具有存在合理性与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巴迪欧将他的这一文学理解运用到具体作品分析中，对荷尔德林、马拉美、兰波、保罗·策兰、佩索阿的诗歌，贝克特的戏剧小说，瓦格纳的歌剧等文艺作品做出了详细分析。我们选取马拉美与贝克特两人为例，对巴迪欧如何以非美学思想理解文学事件的真理生产，以及他具体如何解读文学作品做出分析与说明。

马拉美作为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重视语言的诗性功能。他反对把诗歌语言视为现实事物的单纯描述与重现，主张“纯文学”的诗歌理念，力图通过语言的象征手法，表达出对抽象观念的理解。巴迪欧关注马拉美诗歌，并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关注诗歌能够生产的、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真理生产。巴迪欧指出，现代诗歌把自己定位为一种思想形式。它不仅是真理在语言肉身中的有效性显示，更是一套使得真理自我发言、自我思考的艺术操作。伟大的诗人会组织并形成独特的语言文字配置，使诗歌作品成为一种思想体系的感性呈现方式^{[9]20}。

通过对马拉美诗作《骰子一掷》的散文化改写，巴迪欧提供了一种事件性文学批评方法。巴迪欧指出，马拉美这首诗语言高度浓缩，就像一个谜题，有着某种侦探性元素，需要阅读者自己从中预设与判断，从而进行发掘与阐释^{[1]238}。诗作就像一个随时准备开始的事件，以动态形式呈现，而非静止的描述。一切字词不构成有意义的诗句，需要读者自行进入文本进行组合，通过语言的刺激，形成诗意图象。诗歌不要求我们对其进行阐述，而是要求我们进入构建文学性的活动之中，在阅读中寻求语言结合的过程^[14]。巴迪欧通过语词组合分析，指出马拉美的这首诗描述了在不知名的海面上，一位遭遇海难的老人对生死的感悟。老人满含迟疑地抛出骰子，将生命交付于天意。整个诗作的语言、结构、意义阐述都十分新颖独特，诗歌含义是从不可确定的字词组合出发而做出的偶然选择与解读，这种文学性实践活动，对事件概念所包含的未知与不可确定性做出了精彩呈现。而这也体现出诗歌对文学自身的一种反思。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文学性如何通过语言获得展示？诗歌作为语言的产物，并非按照日常语言交际的编码规则来进行运作，而是以诗性语言割裂了语言与物、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诗歌是一种关于语言的艺术，通过反常规语用法，创造一种感性体验世界的方法和新颖性文学效果。诗歌作品开启了文学事件发生的可能场所，而真理就隐藏在对作品语言的反复写作与阅读之中。马拉美希望通过不确定的书写阅读和随意字词排列，展现语言生成文学的过程，从而捕捉文学事件的发生。诗歌最重要的并不是表达什么，而是应该借助语言吸引人们进入文学本质的思考活动，思考文学发生了什么、文学如何生成等问题。诗歌起到激发我们的探究欲望，引领我们进入文学运作过程的作用。诗歌（文学）是

一种行动，也是一种事件，刺激文学真理的出场^{[9]29}。马拉美把这种从语言到文学的内在思想传递称为“移位”。移位使得语言摆脱与客观现实物的对应，生成关于文学的观念。此外，“移位”使得作品成为文学真理的存在载体，从而隐去了作者和阅读者主体。诗歌只承载文学真理的存在，而不彰显主观的个人存在。诗歌的书写减少了作者、读者的主体身影，所传递的文学真理也将面向所有人。诗歌就是一种无关乎个人的集体性普遍行动^{[9]31}。

如果说巴迪欧对马拉美作品的解读是将诗歌“散文化”“非诗化”，那么他对贝克特实验小说进行的就是“诗歌化”解读。巴迪欧不认同把贝克特单纯描绘成一位追求现实荒谬性和虚无主义的戏剧家，尝试还原贝克特的多面形象，重点关注贝克特的实验性小说创作。巴迪欧指出，贝克特不仅是作家，更是一位艺术哲学家。贝克特以艺术、以文学的方式思考关于语言与现实的哲学问题。贝克特通过积极容纳无秩序的混沌状态，反映现实世界荒诞、混乱、空虚的一面，揭示荒诞背后难以言说的真实存在，以及全人类的一种“普遍人性”。贝克特作品总体上来说是充满希望的，而不是绝望的；是积极乐观的，而不是悲观虚无的^{[15]序12}。贝克特作品的独特性和丰富内涵，都要求哲学对其文学做出专门的回应和表达。他的作品并不以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取胜，而是以隐喻性、哲理性、实验性见长。他所关注的不仅是现代人的生存境遇，还有对文学艺术活动本身的思考。贝克特认为，写作不关乎外物，而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作家的理想是尽力“消解语言”，克服语言对现实的变形，从而揭示出隐藏在语言背后的真实，即使这一真实可能是一片虚无。在早期文论《普鲁斯特》（1931年）中，贝克特借助对普鲁斯特的分析，阐述了这一文艺美学思想。他指出，艺术创作是一种深入挖掘的过程，就像剥洋葱一样，通过减法到达“理念的核心”，呈现出一种文学的本真存在。艺术作品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对艺术观念的发现、揭开和挖掘^[16]。写作过程中，贝克特越来越不满于小说文体形式对沉默、虚空的无效表达，从而转向戏剧创作活动。巴迪欧注意到贝克特的这一思想转变，指出作品《怎么回事》的发表，是贝克特文艺创作的事件性节点，标志着他小说实验的最后挣扎和正式终结。自从贝克特在作品《无法称呼的人》中舍弃情节、段落划分、标点符号甚至人物等小说叙事基本要件之后，其小说创作便陷入“无话可说”的境地，《怎么回事》可以看作对《无法称呼的人》结尾遗留的“是否继续走下去”问题的思考与延伸。《无法称呼的人》通过对叙述者“我”内心世界的追寻，表达出一种主体的身份迷失与自我认知焦虑。“我”处在混沌之中，没有性别、没有形象、没有姓名，只是一个空洞的言说声音，通过滔滔不绝的话语，努力寻找和证明自我存在。这一“无法称呼的人”似乎能够意识到自我的缺场，因此总是期望通过给自己命名，找到最终的在场。就这样，“我”只能不停地说话，在无法现身的荒诞情境中挣扎着言说，从而证明自我的实存。这样的一种主体意向体现出贝克特对现代人类空虚、焦虑的普遍生存现状的思考。巴迪欧将此时的贝克特思想概括为一种“唯我论”，主体处于存在的灰暗状态，深陷不断努力证明自我存在却努力无效的悖论与荒谬中。在贝克特营造的混沌与封闭时空内，不会出现任何能够确定自我的事件，主体只好不断追问、寻找、言说着自己。这种自我认定的尝试，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环境中的人物永远徒劳无益、无所作为，处于等待不可发生事件的极度焦虑和精疲力竭状态。巴迪欧指出，贝克特在《怎么回事》里下决心打破存在的灰暗状态与苦苦挣扎的我思之间的对立。“我”不再困惑于自己的身份确认，而是以重复呓语和话语转述的方式，在混沌泥泞的语言世界中爬行抗争，试图寻找新的存在方式。身份认定成为一个需要主体主动实践的行动，最终将根据自我所遭遇的不同事件而精确界定。主体通过积极直面“即将发生的事”，通过直面与他者相遇的瞬间来体现自我的确定性存在^{[15]16}。被动等待主体转变为遭遇事件刺激后主动现身的行动主体。

《怎么回事》是贝克特最难以理解的一篇文本，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长篇散文诗。巴迪欧将这篇形式奇特、语言破碎的文本视为一个事件，从中不断析取意义，挖掘其中潜藏的文学性，以及文本所包含的哲学思考。贝克特的小说实验本身十分激进大胆，他质疑语言能够真实清晰地表现客观世界的能力，希望通过文学活动寻找语言之下隐藏的“无法言说的真实”。在语言表征危机下，贝克特通过纯粹文字言说世界的能力逐渐退化。他的小说文本为了体现现实本来的失序与无意义状态，出现语词混乱、难以成文的现象，基本丧失了可读性。贝克特小说实验的失败也促使他转向戏剧创作实践，通过戏剧表演直观展示现代社会下的一种虚无、荒诞的生存体验。《怎么回事》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充分展现了传统语法规则在揭示存在真实状态时的无力，也显示出贝克特希望以“反小说”的尝试，寻找更加强有力的语言表达方式，揭示混沌与迷雾之下的真实存在状态。

四、巴迪欧文学事件论的意义及局限

巴迪欧文学事件论以事件哲学视域下的“非美学”认识为本，其文艺批评重点在于对文学活动独特性与内在性的挖掘。他指出，集中彰显文学独特性与内在性特征的，是能够刺激文学性真理现身的事件。文学研究应回归作品、回归文本，从无数作品中区分、辨识出新颖事件，从事件体悟文学活动所开启与创造的人类独特生命体验^{[8]96}。文学的理解是一种后-事件的主体介入状态。文本语言是文学效果的发生以及主体主动参与文学活动的中介与桥梁。而静止的文本要成为文学，必须通过主体进入文学事件，从静态物质性文本转变为作为动态的文学活动，维持一种独特的纯文学行为。虽然巴迪欧尝试建构一种事件诗学，强调文学活动的独异性存在价值与真理生产能力。但是他的诗学思想在理论建构与文学作品具体分析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局限与不足。

首先，较为突出的一点，是巴迪欧事件哲学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间隔与距离。巴迪欧以哲学家身份关注文学艺术活动，对文学作品的论述与解读多与个人哲学思考紧密相关，其论述笔墨多放在对事件思想的哲学内涵、哲学与艺术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哲学空间”中艺术状况的展示，而对文学活动基本规律、文学作品研究方法等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并未过多论述。巴迪欧文学事件论虽然承认文学的运作与呈现有其独特法则与规律，但他始终强调文学作为一种“哲学机器”的真理生产功能。文学以特殊的诗性语言进行哲学思辨，因此具有存在合法性。文学作品能够呈现自身所蕴含的哲学真理，对真理进行“诗性言说”，从而成为哲学的理想代言人之一。从巴迪欧关注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到，他十分热衷于对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与分析。这是因为巴迪欧发现现代文学作品总是呈现出一种语言的沉默与混乱现象，这种集体性沉默形成难以理解的文学事件，是对真理问题的一种独特减法式表达。真理没有实存，是超-语言的，是不可言说的虚空。“无言”正确显示出“非存在”真理的难以言说与确定性定义。难以表达的真理不在于定义，而是关乎显现，需要通过主体的积极实践活动形成事件，促使原本非存在的真理出场。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形式，是真理现身的场所，一些真理性认识只能通过文学艺术形式获得表达。巴迪欧认为，关于文学本质的真理性思考重点不在语言形式，而是内在于文学活动之中，需要回归文学的生成与创造性实践，寻找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事件，从而发现文学事件所释放的真理性思想观点。巴迪欧始终强调，文学语言的非透明性需要仰赖哲学家解密才能获得真理的生产与言说。从本质上来说，他并未改变文学对哲学的从属附庸地位。但值得肯定的是，巴迪欧还是对文学与哲学做出了区分。他指出，诗歌，或说文学的隐喻性、感性语言无法替代哲学思辨，如果哲学完全

仰赖于文学的诗性言说，会导致哲学与文学的双重终结。巴迪欧反对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的主张，认为有必要对20世纪哲学的“诗人时代”进行反思性批判，通过哲学与文学艺术“解缝合”，重新迎回当代哲学的复归与文学艺术的独立^{[7][43]}。

其次，巴迪欧文学事件论对如何进行文学事件性批评并未做出理论概括与方法指导，未借用现当代其他理论家与文学批评者丰富的文学事件思想资源。巴迪欧从具体文本出发，以阅读实践方式对文学的事件性做出论述，但缺乏文学事件的方法论阐释。这一方面是由于巴迪欧反对20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研究的“语言化”倾向，注重文学活动现实存在与实践意义，认为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应从对文学领域内现实发生事件的抓取和分析入手，强调主体介入与实践操作；另一方面是由于巴迪欧局限于自己的事件哲学思想，未充分借鉴现当代文学事件研究成果导致的。事件概念是当代西方思想家共同关注的理论主题。怀特海、海德格尔、德勒兹、德里达、齐泽克等许多理论家都对事件做出过积极思考，成为事件诗学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东西方文学理论家，如乔纳森·卡勒、特里·伊格尔顿、德里克·阿特里奇、芮塔·费尔斯基、希利斯·米勒、小森阳一、小林康夫等，从文本的意向性、文本的生成性和阅读操演、文学的本质界定、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等不同角度探讨了文学事件内涵，以及事件思想对文学阅读和批评带来的创新性认识。虽然巴迪欧的事件诗学建构不够全面，但是面对如此丰富的事件思想资源，一种强调文学活动独特性与内在性价值意义的事件诗学已成为可能。英国文论家德里克·阿特里奇在《文学的独特性》一书中便针对文学基本问题合理吸纳事件思想，指出文学的独特性就在于文学作品作为事件的理论维度与意义。我们不应把文学再视为客体与对象，而应视为一种事件。文学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始终向他性、异质性敞开并予以回应，而文学作品就是读者每次阅读时重新表演的事件^{[17][58]}。特里·伊格尔顿也在《文学事件》中指出，对“什么是文学”问题的回答应该通过文学事件的发生和无数不同的本质探寻方式向人们自我揭示。文学意义的解读不再是针对作为实体的对象化文本，而是一种策略，在于形成文学事件^[18]。

事件哲学思想以其本体论的优先性以及高度的融通性可以被纳入文学场域理论话语，使我们在把握文学多重发展轨迹的基础上获得新的理论洞见，对当代文学理论问题做出新的解答。比如，全球化与电子媒介的冲击导致文学领域逐渐兴起“终结论”话题。“文学终结论”认为文学研究显现出日益衰微的态势，走向边缘化与碎片化，文学的特质在传统非文学领域诸如艺术图像、建筑造型、历史法律文本、影视表演、网络游戏等日常生活众多方面都有充分体现。“文学终结论”作为文学本质与非本质的变体问题，进一步引申出许多当代文艺学研究新话题，如“文学性的蔓延”“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经典的消亡”“文学研究的边界外移”等。这些问题造成当代社会对文学本体的理解困难，而事件思想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一种新视角。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作为人文科学的一种独特类型，文学始终拥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一点可以在文学性的蔓延现象中获得反证。若文学失去了存在意义，就不会在众多领域内还能够发现文学的因素与特征。因此，不是文学走向“终结”，而是传统文学定义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已然陈旧，急需重新思考与转型。文学不再是简单依托纸媒的书写艺术，而是包含许多新变化与新内容，成为一种动态的实践活动。事件诗学强调将文学活动视为一个实际发生的变化事件，注重文学作为事件参与和改变现实世界的当下影响力，在现实意义上重思文学的存在性内涵。一方面，现实的、当下的社会发生事件往往影响到文学的书写与接受方式，致使文学边界产生蔓延；另一方面，人们在“事件”的语境中对于“何谓文学”的理解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以事件为切入点审视文学的书写、阅读和传播，有利于反思科学技术、历史文化、伦理道德思想变更和文学观念生产之间

的联系，从而对于整个文学的生成机制、流变线索和理解认知有所更新，我们关于文学的认识也跟随社会历史变化而不断扩容。事件思想有利于打破学科话语，以一种现实关注性、跨学科性和文史哲的交互与融通，使文学总是向着新的可能性敞开。在事件框架下认识文学，不仅考虑到作者写作、文本语言、文学意义生成，以及读者阅读接受等多个视角的交融，也将文学看作总是有待发生，始终敞开的状态。文学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客体，而是具有当下的现实存在性，是一个需要积极参与的现实事件，对文学本身的理解、文学定义标准的厘定需要不同理解事件的认可与反思。事件理论使文学研究走出20世纪以来“语言化”“文本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困境，文学与现实世界之间展示出更为多层次的交流与互动，也在后理论时代的大背景下为探讨文学出路提供了一种新的尝试和可能。正如阿特里奇在《文学的独特性》中所述，不论将文学的本质视为语言、作品还是文本，试图从形式角度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都必然走向失败。文学不应被简单归纳为一种独特的语言书写方式，而应是以语言文本为中介的一种人类实践活动。有了这种失败，作为现实文化实践活动的文学认识才能获得理解^{[17]3}。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事件而发生，文学本质则在实践过程中被不断建构。作为文化实践活动的文学，总是形成不可重复的体验性事件。对文学的理解和认知不应关注本质与非本质的争论，而应有赖于对经验性文学事件的考察。

总而言之，巴迪欧文学事件论强调的是文学作为一种实际发生事件的存在意义，主要思考文学不同于其他写作活动的独特性，并将文学的发生和效果视为文学性的关键特征^[19]。虽然并未形成体系完备的“事件诗学”，但巴迪欧对于文学的理解，从本质提取转换到行动实践层面，通过主体对文学事件的发现与把握，思考文学活动的存在价值，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当代文论中的生命力。文学不仅“解释世界”，更召唤主体切实参与到文学形成的历史过程之中，以文学的独特方式“改变世界”，一种强调实践性的“事件诗学”已成为可能。事件概念本身具有的唯一性、流动性、生成性、包容性、参与性，使文学本质研究既能够保持文学性的自律原则与独特性特征，又能够打开语言结构理论的束缚，向社会、文化、历史等多维度开放。文学活动召唤复数的集体性主体切实参与到其文学性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以文学的独特方式“改变世界”。正如伊兰·罗纳在《事件：文学与理论》一书中所指出的，文学事件与文学本质认识相关，事件诗学提供了一种对文学本质的重新解读。文学作为一种带有想象性的审美建构，一种复杂的语言书写艺术，本身就是创造新感觉的事件，并始终回应人类对语言创造与新表达的要求^[20]。文学存在的问题不再是“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而是“如何去谈论与实践文学”。文学不仅是书写的语言，还是主体用语言做“文学”之事的方式。

参考文献：

- [1] 阿兰·巴迪欧. 存在与事件 [M]. 蓝江,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2] BADIOU A. Logics of worlds: being and event, 2 [M].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9.
- [3] HALLWARD P.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115.
- [4] CORCORAN S. The Badiou dictionary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15: 368.
- [5] 阿尔弗雷德·怀特海. 自然的概念 [M]. 张桂权, 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175.
- [6] 姜宇辉. 德勒兹身体美学研究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32.
- [7] 阿兰·巴迪欧. 哲学宣言 [M]. 蓝江,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8] 谭成. 阿兰·巴迪欧艺术哲学研究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 [9] BADIOU A. Handbook of inaesthetics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0] 周计武. 艺术终结的现代性反思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28.

- [11] 阿瑟·丹托. 艺术的终结 [M]. 欧阳英,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 [12] 蓝江. 忠实于事件本身: 巴迪欧哲学思想导论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280.
- [13] 阿兰·巴迪欧. 文学在思考什么? [M] //白轻. 文字即垃圾: 危机之后的文学.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 [14] 艾士薇. 阿兰·巴迪欧的“非美学”思想研究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250.
- [15] BADIOU A. On Beckett [M]. Manchester: Clinamen Press Limited, 2003.
- [16] BECKETT S. Proust [M].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78: 64.
- [17] ATTRIDGE D.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18] 特里·伊格尔顿. 文学事件 [M]. 阴志科, 译. 陈晓菲, 校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 32.
- [19] 何成洲. 何谓文学事件? [M] //何成洲, 但汉松. 文学的事件.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2.
- [20] ROWNER I. The event: literature and theory [M]. Nebraska: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2015: 26.

Uniqueness and Inherency: Badiou's Attempt to Construct Event Poetics

Zhang Danyang

Abstract: Alain Badiou's event philosophy systematically answers the questions of existence, truth and subject, and points out that event has the priority of existence in the sense of ontology. Later, he extend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vent philosophy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art,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art, philosophy and truth, and puts forward the “inaesthetic” theory. The inaesthetic program calls for the occurrence of novel events, and strives to use the unique language form of art to produce truth, so as to realize the “de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art. Badiou tries to put forward an event poetics emphasizing the uniqueness and inherency of literature, pays attention to literature as an actual event, and inspires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to go beyond the pointless debate on the issue of essence. Although his event theory has certain inspiration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research, his construction of event poetics still has limi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Only by absorbing the rich literary event thought resources of other theorists, can the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system of event poetics be constructed.

Keywords: inaesthetic; literary event; uniqueness; inherency; event poetics

(收稿日期: 2022-10-31; 责任编辑: 陈鸿)